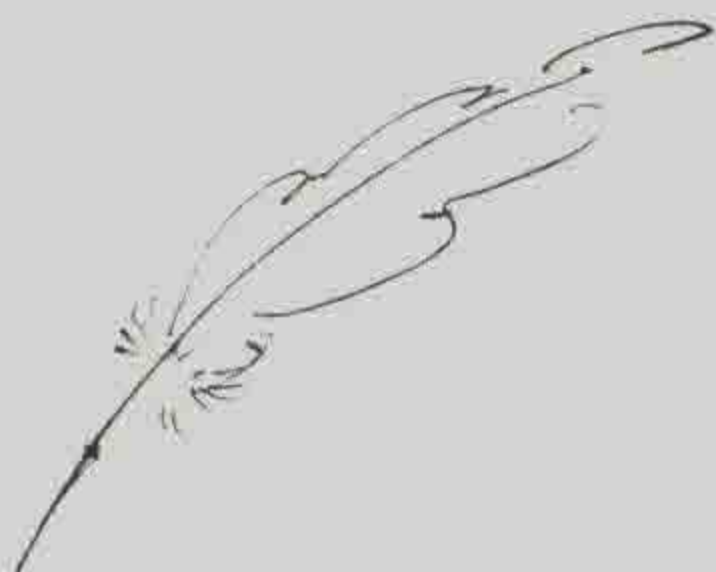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托马斯·潘戈 Thomas L. Pangle ● 著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教诲

Aristotle's Teaching in the *Politics*

李小均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教诲

Aristotle's Teaching in the *Politics*

戈 Thomas L. Pangle | 著

李小均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教诲 / (美) 托马斯·潘戈 (Thomas L. Pangle) 著; 李小均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5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Aristotle's Teaching in the *Politics*

ISBN 978-7-5080-9157-0

I. ①亚... II. ①托... ②李... III. ①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 384-前 322)—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502.233 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5200 号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2013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0865 号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教诲

---

作 者 [美]托马斯·潘戈

译 者 李小均

责任编辑 王霄翎

审读编辑 马 飞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5月北京第1版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23千字

定 价 69.00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出版说明

在马其顿宫院长大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其父曾任亚历山大大帝祖父的御医）17岁赴雅典留学（公元前367年），师从柏拉图凡二十年，直到先师去逝；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回马其顿任亚历山大傅保。亚历山大登基后，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开办吕凯昂学园（公元前335年），讲授诸学，流传下来的讲稿奠定了西方学问的基本形态，史称西方学问的第一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好些哲学术语，如今也已成为我国学述的常用词。

在我国的西学研究中，古希腊学术研究一向寂寞，唯亚里士多德例外，从未遭受冷落：吴寿彭先生自知天命之年发奋翻译亚里士多德，历时三十年，垂译后学，其懼滋甚；苗立田先生主持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嘉惠学林，模范昭明。

“知典型之在望，亦可以感发而兴起”。观当今西方学界亚里士多德研究进展，始知我国研究之差距不可谓不大。我辈后学理当追前辈德范，自励身心，再图精进。“亚里士多德注疏集”旨在从两方面推进我国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从笺释入手完善亚里士多德汉译全集，采西人各家经诂纬织亚里士多德诠解——汉语学术欲究西学根柢，非如此不可。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09年5月

# 目 录

引言 亚里士多德教诲的修辞策略 .....	1
解读亚里士多德“讲稿”遇到的挑战 / 1	
亚里士多德与历史语境的关联 / 8	
理论研究给法治带来的危害 / 10	
古典的共和主义对现代的共和主义 / 12	
现实中的立法缺陷 / 17	
哲人的超公民美德 / 26	
第一章 政治的特殊性和至高性 [卷一] .....	33
亚里士多德的论辩过程 / 35	
方法的转变 / 37	
城邦的自然性 / 39	
财产问题 / 52	
奴役的自然基础 / 55	
批判希腊合法的奴役 / 63	
自然的获取技艺与非自然的获取技艺 / 68	
家庭中的政治和君主统治技艺 / 82	
回顾与前瞻 / 90	
第二章 历史上最好的政体 [卷二] .....	92
批判柏拉图 / 93	
批判法勒亚 / 104	
批判希朴达摩 / 107	
最受尊崇的希腊政体 / 110	
非洲政治生活的高峰 / 119	
梭伦的雅典民主政体 / 124	

<b>第三章 政体间的正义争论 [卷三]</b> .....	127
关于公民的争论 / 128	
共同利益的标准 / 134	
政体有多重要? / 137	
好人对好公民 / 142	
有德之人共和城邦的不切实际 / 156	
人的政治本性问题 / 162	
关于分配正义的争论 / 174	
民主政体的理由 / 179	
政治哲学走上前台 / 189	
绝对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 / 201	
再次突然过渡 / 214	
<b>第四章 改良现实中的政体 [卷四至卷六]</b> .....	216
政体分类的新方法 / 218	
一场有意义的失败实验 / 223	
各种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 / 229	
指导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中政治家的基本原则 / 232	
现实中的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和僭主政体 / 234	
最好且可行的共和政体 / 241	
三种组织功能 / 251	
共和政体的毁灭与保全 / 258	
君主政体的毁灭与保全 / 274	
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反思 / 282	
<b>第五章 绝对最好的共和城邦 [卷七至卷八]</b> .....	292
最值得选择的生活 / 295	
最好共和城邦的前提条件 / 311	
政体的本题 / 317	
教 育 / 332	
<b>参考文献</b> .....	346
<b>人名索引</b> .....	363

## 引言 亚里士多德教诲的修辞策略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教诲》，这个书名以一种比表面看上去更全面的方式提出了本书独特的方法。这里的“教诲”有两重含义。本书的主旨是，亚里士多德极力想教导我们的政治哲学内容与其高超的教学活动形式密不可分，在整个教学活动中，他都极力鼓励我们参与——亚里士多德身体力行地将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有机结合，为政治哲人提供了榜样，告诉他们在讲演和写作中应该如何传达教诲。换言之，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实践活动的公开研究，是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政治实践形式，是高度自觉地干预政治生活。如果我们没有密切注意亚里士多德接近潜在学生并与之对话的那种足资典范的审慎方式——他知道这些学生能力不同，需求各异，身处各种对立冲突的政体语境或与其抗争——我们就学不到这个哲人极力传达给我们的关于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以及理论和实践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教诲。此前，现代学人大都没有理解《政治学》中这一条曲折的教育之路，因为，除了极少例外，解读都没有认识到哲人亚里士多德心理上微妙而多元、语言上诙谐而严肃、伦理上富于公民责任感的教育沟通方式，也没有对此教育沟通方式进行回应和挑战。

### 解读亚里士多德“讲稿”遇到的挑战

在我们见到的非残篇的那部分作品中，亚里士多德为其书面沟通选择的修辞方式是讲稿——[2]尽管后来被当成著述刊布做了修



## 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教诲

订,<sup>①</sup>但还是偶尔会有明显痕迹,折射出原初的演说面貌:“听众”是一群“有闲”或“在校”的贤良。<sup>②</sup>不同于柏拉图或色诺芬的对话录,也不同于诗人的戏剧和史家的叙事,亚里士多德这种书写方式让人觉得他是对正在讨论的基本问题直接给出了答案。亚里士多德的讲稿或著述,尽管其探讨的性质避免了武断,但自古以来却以教条而出名——这种印象被托马斯·阿奎那和许多当代阐释者以不同形式强化。<sup>③</sup>当然,不可否认,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伦理政治著作强烈支持(通过扩展而加强了)那种“美好”的“贤良”观;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些贤良就是他们社会共同体的领袖和“良心”。只是慢慢地,特别是在受苏格拉底启迪的问题和质疑的引导下,读者或许才能看清这种最初的刻意印象是多么不完整,然后,他们才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设计了有教育意义的表面现象来遮蔽,但同时又诱人走向一条更艰难但也更自由的、辩证的上行之路。要走上这条路绝不容易或安全。有些深刻的阐释者认识到,亚里士多德暗中有强烈质疑与挑战的倾向;他们将这归因于亚里士多德隐蔽的激进怀疑论。因此,笛卡尔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做了对比之后说:“他们之间没有区别,只不过,柏拉图追随老师苏格拉底,坦荡地承认他从来没能够发现其实确凿的东西,因此只满足于书写在他看来是可能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不那么坦荡,尽管他做了柏拉图二十载学生,基本学说与老师无异,但他完全改变

---

① Lord 全面分析了现有的传播证据和对这些证据的评论之后总结说(1986, 159),“极少有真正证据表明,《政治学》不是出自亚里士多德之手的内容连贯的著作”。参见 Lord 1984, 8-17, 他提醒我们参考 Moraux 1973, 1.3-94; Galen 1822, 4.758; Newman 2. xxxvi-viii and 3. 164-165; Ross 1923, 17; Weil 1960, 55; Dufour 1991, 1. 17; Kraut 2002, 4n3。

② 原初语境最醒目的提示是在 *Sophistical Refutations* 结尾 184b2-8; 参见 Diels 1888, 492-497; Susemihl 1900, 1508-1509; Düring 1966, 32-36; Bien 1968-1969, 290-298; Bodéüs 1993, 83-86, 90-91。

③ 《政治学》的情况,参见 Johnson 1990; Miller 1995; Saunders 1995。不同程度质疑这种《政治学》的学说解读的学者包括 Mansfield 1989, 27-28; Lindsay 1992; Saxonhouse 1996, 116-117; Bates 2003, 7-9; Burger 1995 and 2008, 4, 18-21。

了阐述的方式，将它们当作真实确凿的东西写出来，即使他看起来根本不是那么认为的。”（《哲学原理》，作者的信）蒙田的看法更偏激。在总结长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心得体会时，他写道（1967，211；《随笔》，2.12），亚里士多德是“最大的教条主义者；<sup>①</sup>但我们从他那里学到和知道了一些东西，正好构成了更多怀疑的契机。人们经常看见他故意躲在暧昧的浓雾后面，因而人们摸不清他的观点。事实上，这正是一种积极的怀疑论”（对观 Robinson 1995，70）。帕斯卡尔在评价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时没有那么极端。他认为，学者们往往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至少是政治哲学写作中的微妙而丰富的滑稽转变视而不见，[3] 尽管这样说是对的，但帕斯卡尔却由此暗示，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一样）始终没有严肃的政治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时兴起撰写《法义》和《政治学》，只是游戏之作。那是他们生活中最没有哲学味也最不严肃的部分”。事实上，“那就像是为疯人院制订规则”。“如果他们假装谈起它们像是在谈起一件大事，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听他们谈话的那些疯子自认为是君王。他们让这些疯子进入他们的学说，为的是节制这些疯子的疯狂，尽量少些危害。”（《思想录》条 533，帕斯卡尔 1963）

许多一流思想家和作家总结的亚里士多德的写作特征，提供了当代许多学术阐释急需的良药。<sup>②</sup> 但这些总结在我（审慎的眼光）看来是片面的。我打算表明，亚里士多德用了这样一种方式建构他的文本：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他布置在表面上的烟幕，成为他的对

① Sextus Empiricus 在 *Outlines of Pyrrhonism* 开头的名言：“至于哲学中的研究对象，有人说是发现真理……因发现真理而出名的这些人，有个特定的称谓‘教条主义者’，比如亚里士多德周围的人。”

② 少数几个非常重要的人尽管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写作的矛盾性质，但没有充分认识到他写作中重大的因而是挑衅性的内在矛盾，更没有赏识其中的幽默，玩味其中的教诲：参见 Newman, 1. 480 – 481; Bremond 1933; Voegelin 1957; Düring 1966（尤其 23 – 24, 20）; Aubenque 1962 and 1980; Baracchi 2008。

话伙伴，耐心而顽强地去解谜，那么，我们将走向一条远离怀疑论之路。这条路通向一种理解政治本性的澄澈知识；这种政治受到渴望德性（胡塞尔所呼吁的“最早的社会学”，1965，93）的影响。那种知识尽管表面上很滑稽，但对人类生活有着极其严肃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头几页插入关于方法论的题外话，提供了一些有启发的，也有点儿暧昧的线索来解释他“讲稿”的教育性质，解释他不同层次的听众（他将听众视为是期待或想象中的接受者）。在有关方法论的第一次题外话中，<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他解释了“题材”所允许的“清晰话语”。“政治学研究的高贵正义事物包括了不一致性和可变性，以至于它们看起来不是自然存在而是约定俗成”。让我们失望的是亚里士多德没有承诺他将处理这个令人不安的表象。<sup>②</sup> 相反，他补充说，“美好的事物也有可变性”（他没有提到美好的事物像正当高贵的事物那样引起“不一致性”，也没有提到美好的事物看起来不是自然存在而是约定俗成的）。关于他心目中的美好事物的可变性，他特别指明如下：“许多人受的伤害源于美好的事物：因为有人因财富而亡，有人因勇气而丧”。因此，有两个东西是“最可欲的”。首先，“在谈到那些事物及其基础时，我们只是大略显示真相”（美好事物真正的真相——正当事物和高贵事物真正的真相，[4]特别是从研究“正当高贵事物所包含的巨大不一致性”中得到的真正真相——可能对某些人或许多人有害）。其次，“在谈到只是大多数运用的事物时，我们可以在那些

---

<sup>①</sup> NE 1094b11 - 1095a12；引用亚里士多德作品使用的是 Bekker 页码和行码；未标注书名的引文均出自《政治学》；*Nicomachean Ethics*（《尼各马可伦理学》）缩写为 *NE* 或 *Ethics*（《伦理学》）；*Eudemian Ethics*（《优台谟伦理学》）缩写为 *EE*；亚里士多德的 *Constitution of Athens*（《雅典政制》）缩写为 *Ath. Const.*；*Rhetoric*（《修辞学》）缩写为 *Rhet.*

<sup>②</sup>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只有一次直面传统主义的挑战，不过很短，语焉未详；NE 1134b18 - 1135a15。参考阿尔法拉比（*Alfarabi*）在 *Philosophy of Plato and Aristotle*（2001a）中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评论。

事物的基础上，得出同样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继续暗示，在谈起那些事物的时候，他将提供某种劝导性言辞，这些言辞更接近于人们从“高明的修辞家”那里接受的东西，而不是数学家那里所要求的证明：那样一个很不完美的“精确”程度，恰是“实际事物展示出来的特质”。在接下来明显的重复中（《伦理学》1098a26-31），亚里士多德谈到他伦理著作的特征，将之与对木匠（木匠与数学家形成对照）具有重要性的东西相比：两者都追求“正确”，但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对任务有用”，而后者追求“所是，或是某类东西——因为他是真理的沉思者”。亚里士多德因此促使我们明白，在他的伦理和政治著作中，对成为“真理的沉思者”的关心很大程度上必须与对实际问题的关心结合起来。

亚里士多德在有关方法论的第一次题外话中还表达了另一要点，这是对他主要面对的听众的（诙谐）警告。他事实上“定下了场景”，我们必须在这样的场景想象接下来的演讲。他宣布，年轻人不属于他的听众。年轻人应该离场，或不应该继续听讲。他合适的听众是具有“高贵判断能力”的长者，因为——不像年轻人和某些老人——他们有来自“那种教育”的非科学的知识，“那种教育”包括实践经验，包括使情感屈从于实践理性的统治。或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接下来的重复中（1098b3-4）指出，德性的“首要原理”引起了“某种习性之人的研究”。在第二次关于方法论的题外话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明了他严格限制听众人选的意义（《伦理学》1095a30-1095b13）。他说，他将继续以此为基础或首要原理，所以没有必要再问“为什么或为什么那样？”因为这些道理在“生性高贵，关心高贵正当事物以及一般政治事物”的人看来道理很明白。将年轻人从听众中排除出去，当然有助于避免一再摆脱解释为什么习惯性的意见事实上就是正确。但亚里士多德接下来立刻承认，或许有听众不同意这种限制：亚里士多德暂时将注意力放在这样的听众身上。这表明他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严格限制听众。他要求那样一个捣蛋鬼听几行名诗，[5] 接下来他就（不准确地）引用了赫西

俄德（《工作与时日》，293，295-297；第294行被漏掉）。他强调自己赞同这些话，以此暗示他（与赫西俄德）的听众层次极为不均（Lindsay 2000，442-443）。在他引用的诗句中，人分成三等：第一等“最优秀，他们凭智力独立思考一切”；（第二等是）“高贵的人”，“听得进别人的好言劝说”；第三等即最低等的是“无用的人”——“既不独立思考，也不听人劝，只是将（所闻）储藏在激情中”。亚里士多德首要的听众显然是第二等人，能够被亚里士多德的说理——“诉诸激情的东西”——打动。但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表明，他不会“对最优秀的人”视而不见，这第一等人凭智力独立思考一切，不依靠权威——因此总是问“为什么”。

他的讲稿必须被理解为试图在不同的层面上同时交流，因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有不同的心理期待或要求；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二中对演说进行简短专题处理的主要方式（994b32ff——我们在此看到，那些想象中的伦理学讲座的听众，与想象中形而上学讲座的听众，并不像我们可能最初想的那样有很大的区别）。“讲稿，”亚里士多德指出，“有符合听众固有伦理习性的效果”；<sup>①</sup>“我们要求听到的内容符合我们的习性；否则，听到的”就将是“不可知和奇异的东西”，因为正是“熟悉的东西，才是可知道的”。正是“法律”，<sup>②</sup>“使早已确立的东西的力量清晰”：在“与法律相关的事物中，由于我们固有的伦理习性，神秘的事物和属于童年的事物比我们关于那些事物的知识力量更大”。因此，“如果不以精确的方式言说，有些人将不会接受听到的东西”；于是

① 同样参见 *Rhet.* 1300a30ff：“由于大家都接受那些针对他们伦理习性说话的话语，接受与他们伦理习性相似的话语，所以，说话者如何利用话语，才能显得既符合他们身份，也符合他们的话语，这并非不清楚。”

② 阿威罗伊（Averroes）在校注（译自阿拉伯语，参见 Pines 1979，102-103）中强调，亚里士多德在此和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 1074b3-5）中所谓的“法律”首先指的是宗教。这个观点被 Albertus Magnus 1960 ad loc. 和 Marsilius 1. 在 10.3 接受。

“有人要求引用诗人的话为证”。换言之，“一群人要求一切事物都应该精确的分析；而另一群人因为精确的分析而感到痛苦——要么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要么是因为他们将之看成是闲言碎语；因为精确的分析有这样的效果，在有些人看来，它缺少自由”（对观《政治学》1337b15-17）。“因此，”[6]亚里士多德最后说，“有必要教导所有那些维度如何被人接受，因为不可能同时追求科学和科学的典型方法——而且两者都不容易把握”。

最后一句话表明，如果我们要充分把握亚里士多德内容的教诲，那么努力接受他修辞策略方面的“教诲”是多么重要（对观 Bodéüs 1993, 97-100, 114）。这要求我们牢记他有两类不同层次的听众，因此有两种非常不同的交流：一类听众至少开始被合法习惯性统治——这种在神秘事务方面的合法习性是童年时就从诗人那里习得的——他的对精确的分析感到痛苦，因为他们理解不了精确的分析，或者对其有高贵的反感；另一类听众的性格已经成熟到需要科学的精确，或许还需要具体的例子（只要具体的例子有助于阐明话题）。在他关于方法论的题外话中提到数学家时，亚里士多德反复暗示他对后一类听众的关心。但是，尽管他对后一类听众表现出更大的智性方面的尊重，亚里士多德同时强调，这些听众不仅需要学习他修辞技艺的教诲，而且要学习这门技艺的原理。除非这些受了科学训练的听众学习完以上两方面内容，否则，他们将不仅发现这些演讲令人不快，而且将错过哲人亚里士多德最严肃的教诲。听众中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必须学会辨认那些早就在（和由）“法律”奠定的“神秘的事物和属于童年的事物”的力量。只有在认识到法律——包括与成文法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未成文法——的心理力量的基础上，受过科学训练的听众才能开始认真批判地反思打动他们内心的东西。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为何以及如何支配着亚里士多德丰富的修辞策略，成为他们真正自知的关键。只有通过修习学习城邦的知识，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知，因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 亚里士多德与历史语境的关联

《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最全面可用的分析。在那种社会生活形式中，且通过那种社会生活形式，人类能最全面地发展和揭示他们作为政治的——即作为自我统治的、共和的——动物的本性。那种社会生活的关键前提涉及公民数量、教育和城邦聚居。当然，要获得独立，就需要足够数量的人参与军事防卫。但更具有说服力的是，需要公民能够做出集体判断，[7] 按照美德公正分配官职和荣誉（及耻辱）。这要求公民能够可靠地确定彼此的性格（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公民需要相互熟识或“面对面”地生活）。<sup>①</sup> 遍布在地中海沿岸的成百上千的城邦都满足这些条件，它们从许多代人之前开始，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生活时代（公元前384—332）都存在。因此，亚里士多德将对政治生活科学分析的焦点放在地中海地区和他所生活时代的城邦由于时空与他接近，因此便于他开展研究。

这提供了哲学的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政治学》中没有发现，亚里士多德提到他自己所处的历史政治语境中戏剧性的政治进展

---

<sup>①</sup> 1326a6 - 24; 1327a1 - 3; 1276a26 - 31; 1270a29 - 34。另参见柏拉图 *Laws* 738d - e, *Rep.* 423。关于雅典公民人口的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参见伊索克拉底的 *Antidosis* 171 - 172 和修昔底德 8.66.3。臭名昭著的锡巴里斯城邦，亚里士多德在 1303a28 - 33 处提到了它的内讧，人口可能就有五十万：公元前510年，它就毁在比它小得多的邻邦克罗顿手下（Keyt 1999, 89）。卢梭简洁有力地重新阐释了关于真正自由公民社会基本规模要求的古典教诲的核心：*Second Discourse*, *Epistle Dedicatory* 开头；另参见乔治·爱略特小说《罗慕拉》中“序言”更为雄辩的重述；托克维尔赞扬了中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南部自治城市的公民活力（*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1.4, 2.3, and “Appendix”）；Bradley 1991, 15 - 16；对比孟德斯鸠更为含混的教诲：SL 2.2 和 11.6, 第25和28段。这基本观念对于新近善于思考的政治学家来说也是明显的，可见于 Dahl（1970, 160 - 161, 164 - 165；Sartori 1987, 317）：“最乐观的城邦是或应该是中等规模的城邦，比邻邦要大，但比大型城邦要小”。“为了阻止和最终逆转大型城邦影响，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计划防止城邦变得太大，学会一切技艺中最伟大的一门技艺——即建设伟大而非巨大的城邦的技艺——必须考虑的东西。”

——这个问题历来让现代学人大惑不解。<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写作时，正值希腊人在喀罗尼亚之战（公元前 338）中被马其顿人击败。这为独立的希腊城邦敲响了命运的丧钟。尽管这场战争没有扑灭城邦中自治的公民生活，但它是这一悲剧结局的开始。<sup>②</sup> 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希腊，将之变成他帝国的一部分；有强大的证据表明，亚里士多德卷入了新帝国中心的马其顿宫廷活动。<sup>③</sup>

但是，从《政治学》中完全看不到这样的痕迹。<sup>④</sup> 无论他可能多大程度上卷入同时代的外交和政治活动（Chroust 1973, 1. 155 – 176），作为政治哲人和理论家的亚里士多德关注的不是他所在的堕落的政治环境。他关注的是对在那些情况下——人类永恒的政治本性最完全地显露于言行——关于完全自觉的城邦在表达和期望方面的批判性研究。只有在那样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评估，因而正

① SH (46) 表达了“我们的惊奇和无助，以我们能用的方式不能满意解释”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与马其顿宫廷的关系完全没有影响他的政治理论”。同样参见纽曼 2. xxxiii：“《政治学》中最令我们惊奇的莫过于这个事实，尽管明显写于喀罗尼亚战争之后，这本著作几乎只关心希腊各小城邦及其政体。”我们不妨补充说，当亚里士多德用现在时谈论政治时，他没有注意希腊各城邦已经丧失了独立。

② Rhodes 1986, 章 8；O’Neil 1995, 章 5；关于亚里士多德生前和死后不久（384—322 BC）希腊政治生活衰败的生动写照，可先后阅读普鲁塔克三传：Phocion（402—318 BC），Demosthenes（384—322 BC），Demetrius（337—283 BC）。

③ 因此，希腊的共和国“已经被马其顿帝国性质的君主政体所取代”，这是“历史事实，但碰巧遭到亚里士多德的忽略”，该说法显然很荒诞（Popper 1945, 2. 1；Gomperz 1973, 3. 298）。用 Bernays 的话说（1881, 41），“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政治头脑，又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视角，必然密切关注历史的走向；更何况，他在学院的知己 Hermias of Atarneus 就是 Phillip 公开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在晚古时期有流传很广的传说（参见最有名的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和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亚里士多德传），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但这个传说没有得到时代上接近亚历山大、也提到过亚历山大师承和教育之可信的作家的证实：Chroust 1973, 1, 章 9–13，尤其是章 10（“亚里士多德真的是亚历山大的首席帝师吗？”）。

④ 孟德斯鸠，SL 29. 19 和黑格尔 1995, 2. 210；Bernays 1881, 40–42；Oncken 1964, 1. 15ff, 189ff, 2. 272ff——被 Bendixen 1860, 517 驳斥；Spengel 1863, 2. 57–58（649–650）；Henkel 1872, 89n19, 97n26；Hug 1881；Bradley 1991, 13 and 53n；Kraut 2002, 6–12。亚里士多德在 1327b30 处可能对马其顿帝国投去简短一瞥。



确理解在不那么有利的时空（正如我们所处的时空）中的政治生活。<sup>①</sup>从这个超历史的视角，亚里士多德清晰地洞察出哲学与政治语境之间关系，存在如下重要而永恒的普遍特征：哲学研究带来的自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严峻风险，削弱健康公民社会的根本信仰。苏格拉底的命运生动地证实，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这威胁后，很可能反应过度，动用恐吓性力量进行防卫，反过来对政治哲人构成威胁。<sup>②</sup>因此，政治哲人——只有他们才能完全理解这种无所不在的复杂的政治张力——的责任是既要操纵又要缓解虔诚的公民美德和有德性的哲学怀疑论之间互补性的对抗。[8] 政治哲人利用高明的交流方式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高明的言说和写作方式安全而有效地传达了他们批判性的研究。

### 理论研究给法治带来的危害

在对历史上最早的著名政治理论家米利都的希朴达摩（Hippodamus）的一个重要观点进行批判时，亚里士多德勾勒出了政治哲学研究带来的第一个危害。<sup>③</sup>亚里士多德说，希朴达摩“希望对自

① 麦金泰尔（MacIntyre 1981, 149）说，“亚里士多德不懂城邦生命的易逝，因为他几乎不懂一般的历史”；这句话武断地假定反驳（麦金泰尔没有提供反驳）了亚里士多德或明或暗（《政治学》1451b5-11）关于“一般的历史”哲学和科学价值不大的判断。麦金泰尔的话代表了二十世纪历史教条主义的观点（另一个代表性观点，参见 Saunders 1999 138-139 对 Simpson [1997, xxi] 如何逃避当代历史教条主义者的批判）。类似的十九世纪的历史教条主义者的观点，参见明显属于新黑格尔派的 SH 47。正如我们将看到，亚里士多德敏锐地意识到，同时也很关心公民共和城邦本身具有衰败的普遍倾向，因为它不可避免要走向极端民主制（尤其参见 1286b21, 1293a1ff.; 1298a31; cf. Polansky 1991, 329-331）。麦金泰尔对《政治学》的贬低态度，Yack（1984）已经论证。

② 另参见普鲁塔克的 *Cato the Elder*，尤其是 12.4-5 和 22-23：加图“认为苏格拉底不只是个夸夸其谈之徒，还会变得暴力，也有能力设法成为僭主，奴役雅典，败坏道德和公民，吸引他们接受与法律相违的观点”。

③ “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而创制出最好城邦制度的第一人”——1267b22ff.，尤其是 1268b25-126a28；列奥·施特劳斯（L. Strauss 1964, 17-23）提醒读者注意批判希朴达摩这部分的重要性，他在论《政治学》的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阐明该批判及其含义。